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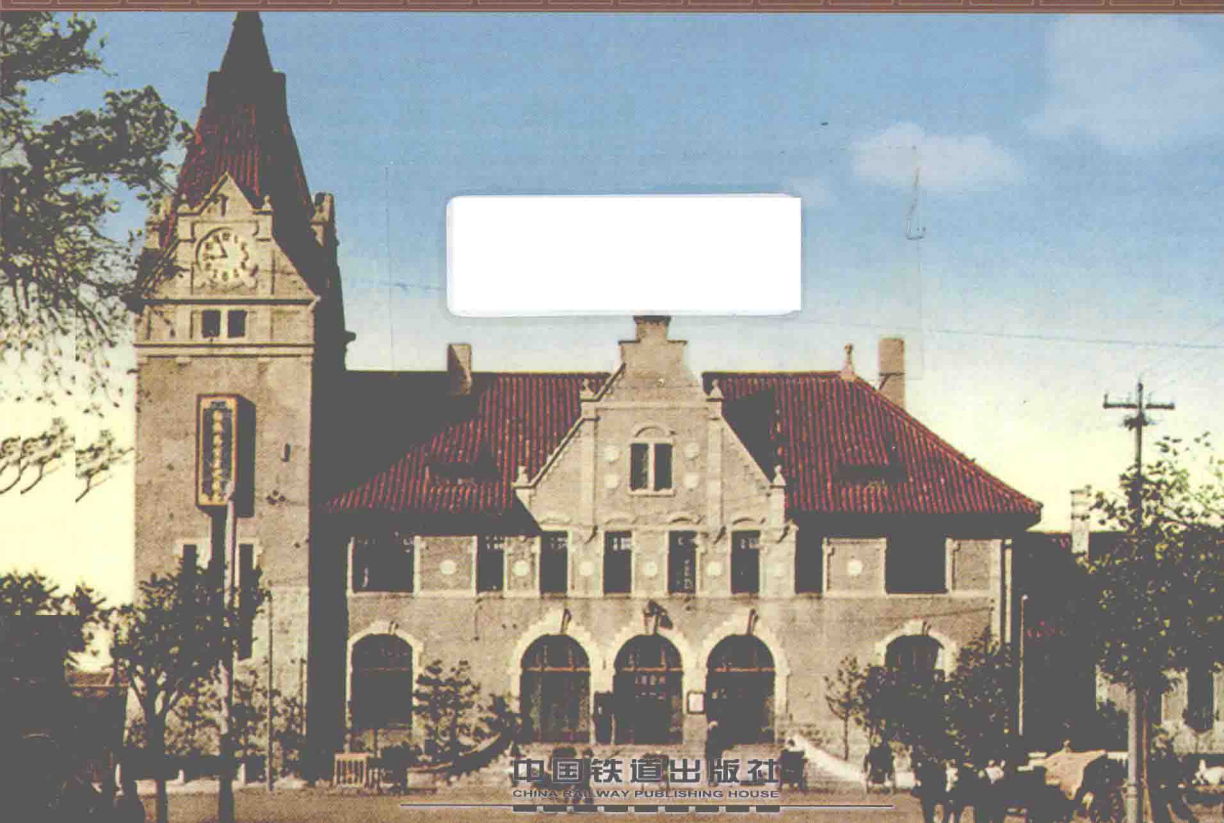
TUSHUO JIAOJI TIELU GUSHI



图说

胶济铁路故事（中）

■ 于建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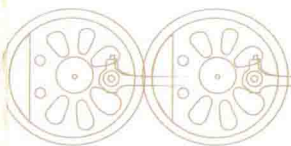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说

TUSHUOJIAOJITIELUGUSHI(ZHONG)



胶济铁路故事 (中)

于建勇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胶济铁路故事. 中/于建勇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113-20776-2

I. ①图… II. ①于… III. ①铁路运输—交通运输史—山东省—图集 IV. ①F53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215号

书 名: 图说胶济铁路故事(中)

作 者: 于建勇

策划编辑: 许士杰

责任编辑: 许士杰 宋 薇 编辑部电话: (010) 51873204 电子邮箱: syxu99@163.com

版式设计: 博翔时代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239千

书 号: ISBN 978-7-113-20776-2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 (010) 51873174 (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市电(010) 51873659, 路电(021) 73659, 传真(010) 6354948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脑海中的一个闪念，可能会掀起一场飓风。雪山中的一丝震动，可能会引发一场雪崩。

学者祝勇曾言：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胶济铁路，这条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铁路，最初，竟然源于一个外国人的脚步。他的名字叫李希霍芬，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正是因为他到山东的实地考察，而且在考察中发现了宝贵的资源：煤矿，于是才有了修建一条铁路的想法。当时他的想法是：“从胶州到潍县的路很平坦，人们可以在那里，而不是在芝罘找到一条铁路的起点。”

在我看来，这条铁路的真正起点，应该是李希霍芬的脑海。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这个想法，也仅仅是想法而已。因为当时无权无势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在中国推动这件事。

这个想法石破天惊。因为在他考察山东这年——1869年，大清帝国包括现在蒙古在内的辽阔版图上，连一条正式铁路都没有。只有一条小铁路四年前昙花一现。那是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的一条长约半公里的“展览铁路”，时人“骇为妖物”，最后由官府“飭令拆卸”。从中既可看出官府的愚昧，也可看出李希霍芬的超前眼光。

放眼中国铁路发展史，这种超前眼光更加凸显。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7年后——1876年才由英商修建。不久也被清政府赎回后拆除。中国留存下来的第一条营业铁路——唐胥铁路，12年后——1881年才修建。中国人主持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则在36年后——1905年才开工。那时，胶济铁路已经通车两年了。

后来，李希霍芬把这个想法进一步完善，在他的专著《中国》一书中，正式提出修建一条从胶州湾出发、连接山东的煤田、经济南府通向北京和河南的铁路。

如果仅此而已，他的考察只限于学术，可他的指向却是国家战略：“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从此，胶州湾进入德国的视野，进而列入德国在远东寻求建立军港的选择地之一。

在经过一番考察比对之后，德国最终选定胶州湾。此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三番五次找借口，极尽小题大作、上纲上线之能事，意在激怒中国，挑起冲突，进而借机出兵。

借口终于来了。这就是1897年发生的“巨野教案”。德国遂趁机出兵，武力侵占胶州湾。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取得了胶济、胶沂济和由济南到山东西部边境的铁路修筑权，以及铁路两旁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

一个学者的想法，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行动。试想，假如李希霍芬没有踏上山东，山东的历史或许将要重写，胶济铁路也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修建，此后由于这条铁路引发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或许就不可能发生，或者说不可能以后来这种方式发生。

比如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积极上书光绪皇帝，“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并于1898年——戊戌年——借助德军在即墨毁坏孔子像之事，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导火索。

比如济南开埠。德国依靠铁路开疆破土，山东巡抚周馥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秘密运筹，在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前夕，济南、潍县、周村三地自开商埠，把自主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比如日德战争。日本对青岛及胶济铁路垂涎已久，1914年趁德国陷入欧战（一战）无力东顾之机对德宣战，打败德国，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此后把开战之前许下的“交还中国”的诺言抛诸脑后，强行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达八年之久。

中国政府积极谋求收回，没想到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直到1922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上才得以解决，决定青岛和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赎

回。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终于回到中国的怀抱。

筹款赎路，再一次点燃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而政局的动荡、政府信用的缺失，让民众的热情降为冰点，以至于轰轰烈烈的筹款赎路运动，最终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儿小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被迫交出胶济铁路之后，日本政府并不甘心，1928年趁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之际，借口保护日侨，先后三次出兵山东，期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重新霸占胶济铁路达一年之久。自然，在谈判桌上，中日双方又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

而对于1929年的胶济接收，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冯玉祥两派又免不了一番明争暗斗。等到胶济铁路收回之后，刚刚平静不久的胶济铁路，又遇上了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条多灾多难的铁路，在军阀混战中再一次遭受池鱼之殃。

尽管中原大战很快结束，可胶济铁路并不安稳。1931年，先是胶济铁路沿线煤商掀起罢运风潮，后是青岛学子在“九一八”事变后乘坐火车赴南京请愿，两次都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此后，胶济铁路进入相对稳定时期，1935年7、8月间，铁道部第四届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简称“铁展会”）在青岛隆重举行，历时一月，参观人数约60万人。而那时青岛全市才40余万人，可见前来参观的外地人也有不少。“铁展会”魅力可见一斑。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暂时还没被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成了许多人辗转流亡的“生命线”。他们中，有梁实秋、罗隆基、陈寅恪、沈从文、杨振声、朱光潜、吴宓、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学者。还有当时的北平首脑、后来成为抗战名将的张自忠。不过，当时的他却顶着“汉奸”的骂名，百口莫辩。这时的胶济铁路，写满了栖遑、悲凉、辛酸和无奈。

不久，这条流亡者的“生命线”，也被日军生生掐断。1938年，胶济铁路沦陷。这是日本对胶济铁路的第三次占领。出于“分区管理”和军事入侵需要考虑，日军1938年做出一项重大决定，胶济、津浦在济南并轨，两座车站合并，这项工程于1940年完工，从而改变了以往胶济、津浦两路在济南各行其道的历史。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打击侵略者的壮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胶济铁路沿线上演。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至上，暂时抛弃前嫌，共同抵御外侮。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又起，胶济铁路再次深陷战火。胶济铁路自从诞生之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伤害。因为重要，所以争夺。因为争夺，所以破坏。这，或许就是它的宿命。

一条不足400公里的铁路，看似冷冰冰的钢轨，经历过多少血与火，承载着多少伤与痛。当我触摸着胶济铁路陈列馆保留至今的百年钢轨时，仿佛触摸着渗透到钢轨深处的百年往事。

建国之后，这条饱经沧桑的铁路才算从战火中脱身。1953年，它承担起一项神秘重任：运送一块重达百吨的巨石。这块巨石出自青岛浮山，通过胶济铁路小心翼翼运到北京。如今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它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1958年，“大跃进”运动初期，胶济复线提上日程，孰料复线建设一波三折，历时三十多年才告完成。期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追溯这段漫长的历史，不难看到深深的“运动”烙印。

改革开放之后，胶济铁路发展迅猛。近十多年来，先后实施了电气化改造，完成了六次大提速，开行了动车组。新的济青高铁也指日可待。届时，全程运行时间将压缩到1个小时，与胶济铁路通车初期12个小时的行程不可同日而语。“天翻地覆慨而慷”。

胶济铁路是一个窗口，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史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屈辱与艰辛，看到了压迫与抗争，看到了曲曲折折、起起落落，也看到了艰难中的奋进、奋进中的崛起。

胶济铁路是一座舞台，一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这座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有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顾维钧、王正廷、王尽美、邓恩铭……还有德国人、日本人，不同朝代、不同阵营、不同国家、不同追求，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

胶济铁路是一部大书，一部跨越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大书。这部大书，写满百年风雨沧桑：有列强欺凌，有军阀混战，有党派之争……抽取任何一个事件，都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回味。本

书就是在“大历史”中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追溯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在。历史睡了，时间醒着。现在的我们，常常因为走得太快，而忘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大拆”，未能“大建”；“大破”，未能“大立”。当我们走得太快时，应该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灵魂的“根”在哪里？在历史深处。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一种正确态度。

于建勇

2015年5月于济南

目 录

Contents

32. “圣诞会”的红色幽灵	1
33. 胶济高层的“南北之争”	14
34. 邓恩铭领导罢工“借东风”	25
35. 张宗昌镇压罢工“开杀戒”	32
36. 张宗昌密探：追踪“赤党”一场空	49
37. 湖岛撞车探秘：让领导先走	55
38. 山东日军：便装背后的阴谋	65
39. 二次北伐：蒋介石济南惊魂	73
40. 济南惨案：美国记者大冒险	90
41. “济案”交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00
42. 接收胶济：蒋介石排挤冯玉祥	111
43. 阎锡山：一封密信引发的败局	121
44. 北魏石佛历险记	131
45. 叛徒王复元的红与黑	137
46. 沈从文：痛别恩师徐志摩	155
47. 王统照：爱情列车向何方？	164
48. 煤商罢运，惊动南京政府	172
49. 胶济铁中：我和名流有个约会	179
50. 坊子站：卧轨拦车为哪般？	190
◆ 后 记	196



「圣诞会」的

红色幽灵

一帮工匠，搞起一个“圣诞会”；一个“圣诞会”，吸引几名地下党；几名地下党，酿就一场工运潮。这场工运潮，登上中国铁路工运大舞台。鲜为人知的是，“圣诞会”会长，成为新生的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胶济铁路于1923年1月1日被正式接收后，一个名叫“圣诞会”的组织也踏着鼓点正式成立了。

这个“圣诞会”与西方的“圣诞节”没有丝毫关系。更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它的成员，不是铁匠，就是木匠，或者是油漆匠。

“圣诞会”诞生于四方机厂。四方机厂是德国修建胶济线路的配套工程，主要从事蒸汽机车、铁路客货车辆的修理和组装，初名“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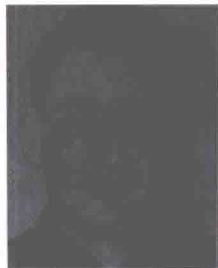
四方机厂

济铁路四方工厂”。日本1914年占领后，改名“山东铁道青岛工场”。中国政府1923年收回后，改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工厂”。同年4月，改称“四方机器厂”，于是有了“四方机厂”这个简称。

郭恒祥发起“圣诞会”

“圣诞会”的发起人叫郭恒祥。

郭恒祥(1894~1929)，又名郭月庭，山东章丘人。幼年时父母病逝，跟兄嫂长大成人。1911年春，与二兄郭恒贞



郭恒祥(1894~1929) 乞讨关外，到日本人侵占的辽阳南满铁工厂当学徒工。

1913年，来到四方工厂做工。

郭恒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胶济铁路收回后，以他为首的铁工首先组织了“老君会”。因为铁匠炉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相通，所以太上老君也就成为铁匠的祖师爷。民间的一些行会，往往拉一尊大神来护佑，这也是惯例。不久，郭恒祥又提议将“老君会”与木工组织的“鲁班会”、油工组织的“葛仙翁会”（东晋道教炼丹家葛洪）合并，成立“圣诞会”。这个“圣诞会”，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协会。

人多力量大。郭恒祥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大家选举郭恒祥为会长，张吉祥为副会长，郭学濂、耿化山（一说姜成瑞，见傅书堂回忆录《党领导下的四方机厂工人的斗争》）为评议长；还制订了《“圣诞会”会章》，规定会员每年捐献一日薪水作为活动经费，每年农历2月15为“圣诞日”。按照中国民间说法，这天是太上老君的生日。

集会结社，尽管是宪法赋予的自由，但当局要求必须备案。于是他们报请胶澳商埠警察厅及胶济铁路管理局备案，成为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工人行会团体。



“圣诞会”徽章

这年3月31日，农历2月15日，是“圣诞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圣诞日。他们请来了戏班，唱戏庆贺。郭恒祥当众宣布“圣诞会”正式成立。会员每人佩戴有一枚“圣诞会”银质徽章。此后，该会逐渐成为工人的依靠，大家遇有，困难如受到工头欺负、家务纠纷等，都找“圣诞会”调解处理，其影响逐渐扩大。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圣诞会”竟然引起一个年轻政党的关注，这就是刚刚诞生才两年的中国共产党。

这年，由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在2月27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20期上，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1921年8月成立于上海，首任主任是张国焘。那年，张国焘才24岁，风头正健。



张国焘（1897~1979）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有分部。北方分部主任是罗章龙，武汉分部主任是包惠僧，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广东分部主任是谭平山，山东分部主任是王尽美。1922年，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



1923年4月，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左二）、张国焘（左四）、刘仁静（左五）等在莫斯科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次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工运陷入低潮，决定伺机开辟新的战场。刚刚成立的“圣诞会”，自然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

神秘来客王荷波

1923年4月，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的中年人秘密来到四方机厂，他的名字叫“满玉纲”。不过，那是假的，他的真名叫王荷波。

关于王荷波的经历，《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陈晓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追忆我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王荷波》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



王荷波（1882~1927）

王荷波（1882~1927），原名王灼华，福建福州人，父亲是衙门的小书办，相当于现在的文秘。继王荷波之后，家里又添了四个弟弟。因家境贫困，王荷波只读过两年私塾。1901年，母亲病故，19岁的王荷波去江苏江阴投靠姨父，在海军里当水手。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王荷波又开始漂泊，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1916年夏，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钳工，直至35岁才娶妻成家。

1921年3月，王荷波等人筹划成立了浦镇机厂工会，王任会长。这天正赶上他妻子分娩，为庆祝工会成立，遂把女儿取名“职工”。

1922年6月，经罗章龙、王振翼介绍，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大罢



罗章龙（1896~1995）

工失败后，他被厂方开除，同时遭当局通缉，被迫转入地下。

王荷波这次秘密来青，是以“五路联合会”（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五条铁路工人的联合组织）的名义，与“圣诞会”骨干郭恒祥等人秘密接洽，并对这个民间行会进行改造。

王荷波对他们说，“圣诞会”扎神棚、供神像是迷信思想，但是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只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就好；不要光花工人的钱，要为工人多办些事情。他还说：你们组织的“圣诞会”，有铁匠、木匠、油匠等，行不同可心同，好比三兄四弟应抱成一团，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团结。你们制订会章、戴徽章、唱戏都可以，这能壮大工人的声势。可是一千条一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情是头条。（《王荷波和邓恩铭改造“圣诞会”》陈光荣）

别看王荷波只上了两年私塾，口才却十分了得。郭恒祥等人听了心悦诚服，请王荷波介绍参加了“五路联合会”。

此后，在王荷波的指导下，“圣诞会”办起了工人俱乐部，制订了《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建起了工人图书室，组织工人自己演戏，还准备筹办工人夜校。

尽管我们不清楚王荷波离开青岛的具体时间，但我们清楚的是，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荷波、谭平山、罗章龙、朱少连、项英，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后又补选为中央局委员（共5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是唯一工人出身的、更确定地说是唯一铁路工人出身的中央局委员。

这次大会还有一个重要议程，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王荷波留下的照片中，笔者对其中两张特别感兴趣。

一张是1924年5月5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为纪念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在孙中山寓所（今香山路中山故居）内举行庆祝集会合影。在这张27人的合影中，有毛泽东、胡汉民、汪精卫、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恽代英、邵力子等人。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王荷波与毛泽东、汪精卫同在一张照片内的合影。

另一张是1924年6月、7月间，王荷波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合影。当时他的化名是彼得洛夫。“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共出席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4人，其中李大钊与王荷波享有表决权。”足见王荷波在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李大钊在苏联



1924年5月5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活动时合影。

一排左起：一为邓中夏、五为张健、六为胡汉民、七为汪精卫、十为向警予。

二排左起：四为叶楚傖、五为王荷波。

三排左起：一为刘伯伦、二为毛泽东、四为沈泽民、七为罗章龙、八为恽代英、九为邵力子、十为戴季陶。

留下的珍贵镜头》，董宝瑞，载《党史纵横》2006年第3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王荷波到汉口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同年11月11日在北京不幸牺牲，是中共牺牲的第一位纪检干部。

邓恩铭青岛艰难落脚

王荷波离开青岛之后，邓恩铭到青岛继续开展工作。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1917年到济南投奔过继给黄家的二叔黄泽沛（曾在益都、淄川、沂水等地做官），并由二叔资助，1918年



1924年6月，中国代表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合影（后排右三为王荷波，前排右一为李大钊）



邓恩铭（1901~1931）

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1年，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领袖王尽美参加了中共“一大”。那年，他才20岁。

关于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工作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山东党史研究室老同志曲琦认为应该是“1923年9月20日”。这天，邓恩铭给邓中夏（字仲澥，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写了一封信：

仲澥兄：

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

青岛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动只有从工人方面入手。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消【销】税，青岛即除外。至于学界则开办为日不多，故学生均寥寥。小学虽多，但均为旧派把持，不易入手，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

四方车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极欲一动，惜余等均不得其门而入，诚属憾事！弟以为作劳动运动非置身其中不可，因外来者加入，十之九引起彼等之怀疑也。弟现拟向机务处谋工作，但因其处长（昔一中校长）感情欠佳，恐不易耳。

S·Y·章程及通告等，均请寄交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收，因弟恐将移至他处也。

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

在此地同志均疲于职务，无暇作党的活动，诚一极堪注意之问题也。不知他处亦有此种情形否？

关于工人组织法章程，请觅几份寄来是荷！

余俟再达。即候

大安。并问诸同志均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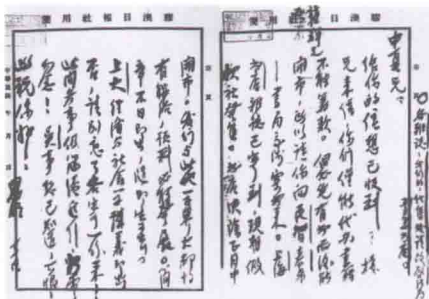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全体职员合影
（前排右四为邓恩铭）

又铭

（1923年9月）20日灯下

来信均请用中式信封，因西式信【封】经常被检查。



王尽美（1898~1925） 邓中夏（1894~1933）

邓恩铭致邓中夏的信

当时，邓恩铭的化名是“丁又铭”。邓恩铭的这封信，收入《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根据此书注解，“S·Y·”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邓恩铭开展工作的艰难。

此信还引出三个人：第一个是“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

王象午，又名象舞，字堃生，山东诸城人。1922年1月与王尽美等一起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赴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工作。与邓恩铭一道，同为青岛团组织和党组织创始人。不过后来因为关键时刻表现动摇，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教。

第二个是“职业学校校长”，他的名字叫王静一。

王静一，字在密，山东诸城人，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原在济南教书，是邓恩铭的老师，师生之谊甚笃。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王静一来到青岛，任胶澳公立职业学校校长，兼《胶澳日报》社长。《胶澳日报》创刊于1923年，除本埠发行外，还向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国发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

还有一个是“机务处长”。笔者查阅济南铁路局档案馆“中华民国十四年编”《全国铁路职员录·胶济线》得知，这个人叫孙继丁。

孙继丁（1887~1978），字丙炎，山东蓬莱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1920年8月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1922年参与接收胶济铁路，并在接收后任机务处长。

尽管邓恩铭与孙继丁当时同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校长，但因“感情欠佳”，邓恩铭没有谋到机务处的差事。后来，他在《胶澳日报》做了副刊编辑。看来，师生之谊远胜于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毕竟，中间隔着几层，远水不解近渴。



王振翼（1901—1931）

随后，邓恩铭把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他在1923年10月4日致“C.H兄”的信中说：“我现担任《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可是还没实行任事。”“四方极有希望，不过相隔太远，往返须费太大。我们的力量此刻实来不及，容当设法。”（《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由此说明，党组织对四方机厂颇为关注。个中缘由，从王振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代表，后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11月15日致刘仁静（时任团中央委员长）信中可见一斑：

就组织上说，吾人今先应注意交通工人，假若交通工人组织好（交通工人较别种工人易于组织，因他们的智识可以说是完全具有新式工业的进取战斗的思想与环境），其他各种交通工人都在交通线之旁，自然成了交通机关的副产，交通工人自然具有领袖他种工人的环境与智识。以此理由，四方是胶济路唯一的机厂，人数亦最多之处，吾人注意胶济路，先从此点起。如此处弄好，全路马到成功，以至于沿路的博山、淄川、坊子、金岭镇（后三处即中日合办之鲁大公司所有）亦马到成功也。此山东精华区，有成功之望矣。（载《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笔者在查阅这封信时，还发现一个重要信息，王振翼曾于1923年11月14日到四方机厂考察过，且与郭恒祥有过面谈。他在信中说：“昨日到东镇（引者注：青岛地名）四方走了一趟，在四方见着圣诞会长，名叫郭恒祥，此人不识字，但他做事的能干与智识却完全是新式机器之下有阶级觉悟的，这是环境使然，亦唯物史观之验证也。谈半时余，约本星期六再会谈一次。”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还是了解当时青岛生活状况的一个很好资料。信中说：“此行按你们预算五十元是不够，青岛这地方的生活程度很高，上街去一次，至少需半元，每日差不多要花一元半，我也不敢多住了。”

这一状况，邓恩铭在同年11月21日致刘仁静的信中，同样有所反映：“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需自筹，困难已极！前一允助办公费五元，至今未汇来；至盼！每月多加五元，则进行上必大有补益。因青岛地狭长而坡多，出门非坐车不可，到四方还需坐火车去。”

尽管生活捉襟见肘，但邓恩铭投身工作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因为他很快就把工作开展到了四方机厂。